

扎巴绛曲的宝座由他的同父异母弟锁南扎巴(bSod nam grags pa)继承。锁南扎巴于是成为第四代拉尊，中国皇帝于1388年给他以“灌顶”的称号，同年他又让位给扎巴坚参(Grags pa rgyal mtsan)。可以从我编的世系表中看出来，权力现在又回到由锁南桑波传下的主支，归释迦仁钦(śa kya rin c'en)的长子扎巴坚参贝桑波(Grags pa rgyal mts'an dpal bzan po)(1374年生)所有。

这位王子似乎主要从事于和平事业，过着宗教生活。西藏人民称呼他C'os rgyal (法王)，至今还忆起在他主持下，写了金色的大藏经(甘珠尔)分别存到十三个主要的堡垒里。另方面，中国历史上也提到他和明朝的关系、明朝对他的支持，记述他修复汉藏大路，保持西藏与内地交通的畅通的成果卓著的贡献，在他的位期间，中国行省与西藏首都之间交通在迅速和安全方面可以与蒙古时代媲美。

中国的影响也表现于帕木竹巴对职位和薪俸的严格分配、各级官员服装佩带的准确规定上面，因此每个官员都有一种特殊及各自的服装和标志。在扎巴坚参和地方贵族关系中，他承认了绛曲坚赞过去赐予其忠诚的文武官员们的领地和特权。

这样绛曲坚参的动乱不宁时代结束以后，扎巴坚参竭尽全力从事于和平及本土繁荣的缔造。虽然他和却希巴同样是一位喇嘛，但住在内廓栋首府，他的兄弟们则住在泽当(节塘，rTse t'an)即丹萨替里寺。

在这位王子的任内，除了由江孜贵族若旦衮桑帕巴(Rab brtan kun bzan 'ap'ags pa)所发动的一次叛乱，似乎没有发生重大事件。

关于这次叛乱的原因没有记载，在江孜史书上也没有提到。但我们不该忘记这些江孜贵族依古代传统是从属萨迦巴的，今天则被迫屈从于西藏的新主人。萨迦巴的光荣是没有过时，还存在于人们记忆之中。他们的住持们不堪受人奴役，沦于贫穷，以及因为帕木竹巴在萨迦大寺驻军而备受耻辱。甚至在扎巴坚参时代，大寺仍然在仁蚌（领司奔，Rin spun）宗本南喀坚参（Nam mk'a' rgyal mt'san）统辖下。

叛乱和争权的尝试可能相当频繁，背后有亲萨迦贵族的支持，因为他们惧怕威胁他们的政治独立的新霸权的建立。仇恨积累如此之深，萨迦巴坚持独立的愿望如此强烈，我们将看到在下一个世纪衮噶仁时代，斗争重新爆发，这时内邬栋也日趋没落，实权落到仁蚌巴手中。整个后藏不能忍受突然被统治，切盼挣脱前藏霸权的控制，于是重新结合在萨迦巴的周围，或聚集在萨迦巴旗帜之下。

在这个时期里，帕木竹巴衰落的条件开始成熟了，我们在本文中多次叙述的过程又在这里重复：正如前述，绛曲坚参曾经在许多家族的协助下，战败萨迦巴，取得了权力。这些家族为的是同绛曲坚参一起挣脱萨迦巴和本勤的统治，或在改变西藏政局的战乱中获得新的权势，扩大原有的权力。胜利者给他们以报酬，或者肯定他们的领地，或者封给新的领地，或者扩大他们的地盘，对最忠顺的贵族则给予大臣的职位。这些最重要的家族，达赖五世史中都提到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仁蚌家族和绛曲坚参的副手穹结的熏奴桑波的后裔。

宗本（rdson dpon）的职位，至少主要的宗（rdson）的宗本都不是世袭的。或者在开始的时候是终身职，但不能由父传子。我们有桑主孜（三竹节，bSam agrub rtse）宗的例

子，这个地方后来成为藏巴汗系的首府。这个重要的据点控制通往前后藏的要道和流入雅鲁藏布江的河口，我们知道至少有来自不同家族的三个宗本。首先是穷结的霍尔班觉桑波（Hor dpal 'abyor bzan po）（达赖五世史p.643）、其次是仁蚌的敦住多吉（Don grub rdo rje）、（同上，p.641）、最后是内（sNel）的班丹却均（dPal ldan c'os skyoṅ）（同上，p.645）。

因此宗本至少在开始时是和庄园的封赐不同的。庄园是第悉（摄政）临时或永久地封给他属下有功的世家和他特别宠爱的大师们的寺院的。

自然在帕木竹巴家族衰弱以后，和它有婚姻关系因而增加权力的附庸贵族就用阴谋或武力来永久占据临时封给他们的职分田。

桑主孜的命运就是如此。仁蚌诸王子永远没有交还桑主孜。

一些这样的家族，首先，仁蚌巴家族权势日增，忘记了本身和帕竹的传统关系，力图推翻帕竹，成为帕竹复灭的原因之一。帕竹的另一个衰微的原因是家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在内邬栋掌握有世俗实权的拉尊系统和在丹萨替里、泽当维持宗教传承的真正的座主系统之间发生了冲突。内邬栋在扎巴坚参之后享有衮玛（Gon ma）这一个神气十足的称号，这个称号在古老传说里是中国皇帝才有的。丹萨替里系有很高的宗教威望，像他的祖师——止贡大喇嘛一样，继续自称“京俄。”

严重纠纷发生在扎巴坚参去世时，暴露出使帕竹的权力大为削弱的裂隙。由于内邬栋系的继承问题引起的严重的政争危险，对所有封建部属都关系重大，因为在这种动乱的政

局中，他们无损伤地当一个旁观者是不可能的。但目前还很难阐明这些复杂事件并解释它们的含义。因为我们掌握的材料里没有足够的有关记载，有时连藏史作家也不能重新写出某些事件的真实意义，有时也许是因为这些事情当日活在所有人们的记忆中而无须详记下来。

《明史》中的资料是有分量的，因为它是从政府档案中得来的资料；另一方面藏文材料的不确实性却让人看到一个可疑的传说。用隆多（Klon rdol）记录的世系（a, p. 14）和达赖五世史里的世系比较，再参考《青史》的简单记载，证明在这一时期，帕竹的三个家支之间发生分裂：一支是行使政治权力的内邬栋支，一支是以京俄为首的寺主一席的丹萨替里和泽当支，最后一支是隆多称为东聚津巴支（gTun rgyud dzin pa），即保持朗家族世系绵延的世俗家支。“京俄”主要具有宗教特性，而不是政治角色，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而称为“拉尊”（Lha btsun）、“衮玛”（Gon ma）、在札巴均乃（Grags pa a byun gnas）以后称为“王”（dBaṅ）的军事首领却获得了对十三万户的控制权。同样程序。过去使萨迦巴分为四个拉让（Bla bran）或四房，朗氏家族现在又重复这个程序。万户一支有着较大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京俄则依靠它的宗教威望和作为古老的祭司传统的继承者的权威。一个人同时占有两个职位不是不可能的；这从却希巴札巴绛曲（准确地称为喇本）的例子中已经看到，阿季王（Nag gi dbaṅ）的例子也是一例。

东聚津巴支既非万户长也非“京俄”，只有少数例外像阿季王曾同时是宗教首脑又任万户长，又作家长；这一支必须照顾产业的产业，保持家族的延续。

这个制度一直到衮玛札巴坚参时没有出什么问题，但他

一死就发生了很大震动，从而破坏了历来的占优势的和谐关系。

现在让我们接着叙述事情的经过。因札巴坚参去世，京俄锁南坚参(Sod nams rayal mtsan)建议：一贯沿用的家族继承制度应该遵守，即权力由叔传侄，因此他指定札巴坚参的兄弟的儿子札巴均乃(Grags pa ṅ byun gnas)为继任者。由于京俄的权力和威望，在他生前没有人敢反对这个意见。

但“京俄”锁南坚参死后情况就变了，他的兄弟东聚津巴支的桑结坚参(Sans rgyas rgyal mtsan)对这种继承的合法性提出了责难。其动机缺乏记载，或者由于对哪些人该担任家族寺院丹萨替里和泽当寺(节塘寺)的首脑没有预先指定。达赖五世曾记载札巴均乃尽管继续认为丹萨替里和泽当寺是他的家支的圣地，却在内廓栋宫进行宗教活动。这样他就同时握有了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这和家族的习俗是抵触的，这样就为札巴均乃的父亲和贵族们的反对提供口实，也给雅壠暴乱提供借口。

这样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破坏了历来指导他们家族命运的双头政体(dyarchy)。“京俄”座主一席因在位者的神圣和学识负有盛名，却在内廓栋的宝座前让位了；虽然札巴均乃仍然保持着 he 作为座主的神圣威严，实际上他本人所具有政治权力超过了宗教权威；家族的寺院特别曾是家族的摇篮丹萨替里寺于是处于一种住持虚席无人作主的状态。

札巴均乃死后，他的父亲桑结坚参取得了权力，后来又由桑结坚参的幼子贡噶莱(Kun dga legs)继任。后者在他的父亲同意下恢复了丹萨替里和泽当寺的独立，把刚刚十六岁的阿季王波(Nag gi dbaṅ po)摆在住持的宝座上(1454)。同

时家族内部情况也困难起来了⁽⁶⁷⁾，住持的权力恢复了，好像又没有人去继承万户长了，因此一次家族会议决定世俗职务和宗教职务也应当再一次结合起来。这一次是“京俄”变成了“衮玛”，这样氏族也就没有灭绝的危险，“京俄”则从戒律中解脱出来而必须结婚。在阿季王波死后，他的儿子尚未成年，由“京俄”却季札巴(Cos kyi grags pa)摄政，他同时占有了“京俄”和“第悉”两个职位。

内部既已分裂，帕竹不敢信任他们的大臣们，尤其是阴谋反对过他们的仁蚌巴了。帕竹已濒于没落的边沿。却季札巴摄政时期是这一摇摇欲坠王朝的未曾有过的多事的时候，阿王札失札巴(Nag aban bkra šis grags pa)在位时期也差不多一样。⁽⁶⁸⁾帕竹看到他们的势力已在衰落，权力逐渐转入仁蚌巴手中。仁蚌巴在贡噶莱时代起就从帕竹遭到削弱的内部纠纷中捞取好处。这个时期帕木竹巴家族似乎苦于缺少伟大人物和堪任大司徒的后继人，而仁蚌巴家族命运已被野心勃勃、卤莽无礼的敦悦多吉(Don yod rdo rje)和错盖多吉(mTso skyes rdo rje)一类人掌握。从贡噶莱时期，“衮玛”和他的妻子仁蚌巴的女儿发生了冲突以来，就已如此。帕竹的部属那时各支持一方，仁蚌巴的错盖多吉占据了雅壠的噶妥(mK'ar t'og)，⁽⁶⁹⁾敦悦多吉则侵入前藏的乃鄂(sNeu)庄园。

这次战争据《年表》(Reu mig)记载在1481年(p.68)，恰恰当阿季王波任内，记作红帽派(žra dmar)讨伐前藏的一次武功。这次事件的重要有几个理由：首先，我们第一次看到žra dmar意思是“红”、噶玛派的一支，同仁蚌巴结成联盟；其次、是可以预见的后藏对前藏报仇的尝试，这类举动后来愈演愈坚决激烈；最后，因为仁蚌巴、后来仁蚌的大

臣(后来宣布为藏巴汗的)的势力正在发展,这样同黄帽派敌对的红帽派也就占了上风。从1436年以来,后藏的许多地方已经脱离了内邬栋而聚集仁蚌巴麾下,听命于仁蚌巴。1436年敦住多吉(Don grub rdo rje)取得桑主孜(三竹节,即今日喀则),同年仁蚌巴即移首府于此地。敦住多吉从穷结巴手中夺取这一地区(SP, 译本, p. 653)。它原是却希沙尔玛(C'os bzi gsar ma)委任给穷结的霍尔班觉桑波治理的。

事情很清楚,仁蚌巴试图取代帕竹的全藏统治权,实际上这个举动已从恢复后藏独立开端。当时阿季王波夭折,留下一个幼子叫扎失扎巴(bKra šis grags pa),“京俄”却季扎巴摄政,仁蚌巴的错盖多吉想被任命为副摄政,在1481年——1495年千方百计夺取权力。

错盖多吉愿意把名义上的摄政一职,留给却季扎巴,即使之专管宗教事务,整个西藏的政治实权则由自己掌握。他的努力只成功一半,在阿王扎失扎巴掌权以后,情况显然恢复正常,尽管仁蚌的敦悦多吉曾侵入乃邬栋,远达机学(sKyid šod)。

在这一时期,西藏又陷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朗氏家族必须和反叛的大臣们战斗,这些叛臣拒绝承认朗氏的权力,各自拿起武器占领地盘。大司徒旧日臣僚的后裔,现在是朗氏的附庸们,一部分支持内邬栋,另一部分则支持仁蚌巴,在那些仍然效忠于朗氏家族的贵族中有甘丹(dGaldan)王子,他在门白兰(sMon dpal lam,甘丹寺住持,1414—1491)的咒术保护下(《白琉璃》, p. 64, SP, p. 290)打败了敦悦多吉1481年对机学的进攻。

西藏到处充满了战争和军事行动。仇恨日深的不同宗教

派别不间的嫉恨开始变成贵族们的对立的核 心，鼓动贵族内哄不已。一方面是噶玛巴，他们已经成为仁蚌巴的教主，拿出他们的咒术和威望来为仁蚌家服务。希望在必要的时候，仁蚌巴会成为他们教派的世俗助手，来保卫本派的利益。另一方面，宗喀巴(Tson k'a pa)所创立的格鲁派(“黄帽派”，黄教)正在兴起，把前藏害怕仁蚌巴扩张的贵族们和一些对噶玛巴的腐败的 形式主义不赞同的教派，争取在自己的周围。

从这一时期起，我们写西藏历史就不能避开红(帽派)和黄(帽派)、保守和革新的对立。对立愈来愈尖锐，贵族们逐渐地不自觉地不再为自己的野心利益而战斗，而成了教派手中的工具。这些教派普遍流传，激盪起人们的热情，以其法师们的智慧和仪轨的极度神秘掌握了人心。教派塑造着西藏的历史。在这种斗争中，贵族精疲力竭，自甘堕落，各教派的喇嘛都在贵族的毁灭里得到了好处，他们逐渐占领废弃的碉堡，这些一度充满兵刃交摩的喧嚣、激情的混乱的据点，现在则荡漾着梵呗的回声，变成了伽蓝和精舍。

由于仁蚌皈依了红帽派，仁蚌王子也从宗教上和帕竹断绝了关系。帕竹事实上是噶举派的一个支派的领袖，他们的显密传承确实可以上溯噶当派的创始者阿底峽(Atiśa)。当新兴的黄教派开始发展并在各教派中占优势时，帕竹恪守正统，赞助改革者的热忱，把宗教传说上它与黄教共有的大师们提高到了显著的地位。

仁蚌家封建领主的势力也逐渐微弱了，正在从西藏历史上销声匿迹，但此时从后藏的心脏即桑主孜的新宫廷里(自从1435年即为仁蚌巴占领)出现了仁蚌巴的一些大臣，以勇敢和自信的姿态，以更大的无畏气概，要实现其主人的梦

想。他们想领导后藏胜利地侵入前藏，此时内邬栋首领已徒拥虚名，不能代表前藏，而黄教派大寺院却代表了前藏。

这样勾画出当时西藏的政治形势后，我们无须再从帕竹家盛衰角度上来研究历史事件了。这个家族仅仅保持了他们的光荣名字，但权力消失了，威望也没有了，因此我们也不必多说其历史了。